

以科研经费形式“雅贿”、“定制式”招投标……

# 医疗反腐风暴中的腐败新花样

据中央纪委官网的消息,7月28日,纪检监察机关配合开展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次反腐的重点突出3个“全”——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紧盯领导干部和关键岗位人员,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

在前所未有的医疗反腐深度、广度之下,新型、隐蔽的利益输送、腐败方式得以曝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发文章表示,严查医疗领域隐蔽利益输送。

## “定制式”招标 作案隐蔽化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消息,浙江省玉环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黄先锋介绍,“定制式”招投标,是指利用医学专业性强的壁垒,在医药用品、医疗仪器等招投标上,巧设“技术参数”“药效参数”等特定条件,打着“科技”“药效”幌子,加码“定制”招投标筛选规则,变相达到与“指定”医药公司长期合作、双向受益的目的。

受贿人和行贿人作案隐蔽化是隐蔽利益输送的另一方式。商讨回扣事宜时,选择在没有摄像头的地方面谈;收受回扣时,选择在郊外的公路上,不下车,收钱即走,全程没有语言交流。这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月6日刊文披露的一起医疗领域隐蔽利益输送案例,案例的主角是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人民医院原院长贺宪伟。

据报道,贺宪伟平日里穿戴普通、生活节俭。但实际上,他在2014年6月就开始收受药商回



扣。他曾主动联系黑龙江省某医药公司董事长何某某,以“不给回扣不用药”相要挟,最终商定何某某拿出医院所采购药品总额的15%给贺宪伟作为回扣。此后,贺宪伟如法炮制,伸手收受另外两家医药公司负责人的回扣。同样是约在郊外公路上见面,不说话、不下车,收钱即走。

据专案组介绍,为减少暴露风险,贺宪伟同药商见面商讨回扣事宜,均选择没有摄像头的地方;收受回扣时,要求单独见面,每次联系使用不同的电话号码,交易地点在两区交界处的公路上;交易迅速,几十秒内完成,无语言交流,不下车,收钱即走;回扣均为现金,通过亲属存入外地银行。

2019年,随着国家对药品采购管理制度的完善,“集采”后供药商药品利润空间变小,给贺宪伟15%回扣后,药商几无利润可言。何某某一直想与贺宪伟商谈降低回扣比例,但每次见面贺

宪伟都不说话,收钱后立马离去,前后不到10几秒。

2020年12月的一天,何某某提前到达约定地点,想着这次一定要让贺宪伟降低回扣比例。贺宪伟的车终于出现了,车停稳后,何某某驱车靠近,熟练地把装有回扣的黑色塑料袋,从副驾驶车窗放到贺宪伟车的副驾驶座上:“贺院长,我们谈谈……”话音未落,就被“嘘”的一声打断,贺宪伟用食指做出“静音”手势,然后摆摆手,开车走了。

据贺宪伟供述,其曾收受某医药代表“小张”的回扣款。讯问其人是谁,只知是女性,40多岁,不知真实姓名,也无联系方式。根据最后一次大概的送钱时间及相关信息,办案人员调取了300多张照片,经贺宪伟指认,“小张”竟不在其中。办案人员扩大范围,在3000多张照片中,贺宪伟一眼认出了“小张”。“小张”真名吴某某,为某公司医药代表张某某特殊关系人。原来,张某

某担心自己出面让人生疑,遂让吴某某出面。为掩人耳目,吴某某又以“小张”的身份出现。

2021年7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另一起案件时,一名行贿人主动交代曾向贺宪伟行贿。案发后,经纪检监察机关调查,贺宪伟在任医院院长期间收受药品回扣、违规干预医院改扩建工程等,总计收受好处费370多万元。

随着对医疗领域腐败行为的查处力度不断加大,医疗领域利益输送逐渐隐蔽化,行贿、受贿双方的手段花样翻新。例如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原副院长马林昆,甘于被“围猎”,对不法药商的前呼后拥、阿谀奉承享受至极,利用手中职权,拿医疗设备、药品、耗材采购准入资格作为筹码,长期与不法药商结成利益同盟,寻找中间人作为“防火墙”,充当“影子股东”,内外勾结大肆受贿,大搞“期权腐败”。

## 以科研经费、 会诊费形式搞“雅贿”

国家卫健委今年5月印发的《2023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提到,重点是各级各类行业组织或学(协)会在工作或推进业务主管部门委托事项过程中的不正之风问题,尤其是以“捐赠”、学术活动、举办或参加会议等名义变相摊派,为非法输送利益提供平台,违规接受捐赠资助等问题。一些滥用的医药学术会议实际上是通过金钱输送或者人脉关系,对入院、药事会、临床处方产生诸多影响。

近期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局发布了一则《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广州市玥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向原广东省某医院人员支付“会诊费”3.5万元好处费,构成商业贿赂行为,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广州市玥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立即整改其违法行为,予以没收违法所得288余万元(在该院销售收入扣除已缴纳增值税、所得税等税费后的所得利润),并处罚款215万元,合计503余万元。

2022年11月17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2022年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典型案例》中,披露了合肥倍思恩医疗技术有限公司商业贿赂案。

据介绍,2020年5月,合肥倍思恩医疗技术有限公司与某县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签订协议,以给付科研费用方式,使其经营的矫正用耳模型进入县人民医院推广销售,销售时间为2020年6月至2021年8月。在此期间合肥倍思恩医疗技术有限公司在县医院共销售178个矫正用耳模型,合肥倍思恩医疗技术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白某某2次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县医院耳鼻喉科科研费用3.5万元。目前该县县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医生收受当事人赞助费用的行为,已移送医院纪检部门进一步核查处置。合肥倍思恩医疗技术有限公司也被罚款30万元。

记者检索发现,2022年11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了5起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典型案例,其中2起是发生在医疗卫生行业的以科研赞助、支付回扣形式进行的商业贿赂事件。

据红星新闻

## 挂号“黄牛”调查——

# “你挂不上,我有办法”

“要号吗,要号吗……”去过三甲医院的人们,应该都听到过挂号“黄牛”在路边揽客的声音。在当前医药反腐风暴的大背景下,“黄牛”、红包等医疗不正之风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 “黄牛”的办法

互联网时代,预约问诊从线下转移到线上,老年人操作不便,家里的年轻人就成了挂号的主力,孙森(化名)就是其中之一。即使非常有抢号经验,每次都瞄准时间盯着医院放号平台,她也有几次抢不上号。

此时,她会首先选择挂医院开出的特需号。就家中老人常去的医院来说,普通号是50块钱,特需号就是300块钱,价格高且不能报销。按孙森所说,知名医院及科室的特需号比普通号好抢,“一般盯着就能抢到”。

但有时,她的家人会选择另辟蹊径,转而求助挂号“黄牛”。

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门诊外,时常盘踞着一批“黄牛”组合,通常由一对母子组成。老太太时不时在路旁询问路人“要号吗”,得到肯定回答后把人拉到远处和负责操作的“黄牛”面谈。

一名“黄牛”开出了她的价格。选择副主任、主任和知名专家分别要支付60元、80元、100元的挂号费和400元、500元、600元的“服务费”,特需号共1000元起,需要提前付200元定金,她还建议,不要选择周末号,光是挂号费就比工作日要贵,加上服务费至少要600元,“钱都交给医院了,不划算”。

“现在都约满了,医生到点就下班,你挂不上,我有办法给你往里面加号。”这位“黄牛”一边展示自己和客户交易成功的聊天记录,一边保证肯定能在本周挂上号。

除了加号,还有的“黄牛”用患者的身份信息实名制抢号。

一名“黄牛”提到,如果不指定医生可以保证本周挂上号,而指定医生则需提前5天预约,不能保证本周挂上号,因为“在系统里抢号,不一定能刷出哪位医生的号”。

与在医院门口游走拉客的挂号“黄牛”相比,有的“黄牛”更加隐蔽。

李玉(化名)曾在“黄牛”处挂过专家号,她提到,那位“黄牛”不加陌生好友,都是让熟人老客帮约。“可能是遭遇过严

打。”李玉说。

## 熟悉的面孔

交谈过程中,第一名“黄牛”提到,她一直挂这家医院的号,对这家医院心血管内科很熟悉,哪位医生看哪种病,什么时间段出诊,她都了解。“你看看病人是哪种病情,想换瓣膜还是搭支架,是心衰还是高血压,可以和我说说,我给你挑大夫,给你发名字和简介,要哪个我就给你约哪个。”

另一名“黄牛”也提到,如果

没有指定的医生可以推荐医生,无论是冠心病还是心律失常,都能挂上相应医生的号。

“在我这挂号,如果你看不上医生,我带你进去找他。”该“黄牛”说。

不仅挂号“黄牛”对医院和医生熟悉,这家医院的执勤人员对这些“黄牛”也很熟悉。

医院保卫处安排执勤人员在门诊外站岗巡视,其中一项职责就是抓“黄牛”。据执勤人员所说,这些人每天早上都会来,赶走之后第二天早上还会来。

至于如何看出哪些人是挂

号“黄牛”,执勤人员直言自己已有经验,“来来回回就这么几个人”。

## 医院的行动

今年5月23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改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体验主题活动方案(2023—2025年)》,《方案》提出,优化预约诊疗平台,推行实名制预约,加强退号、失约管理,严厉打击“号贩子”。

近年来,各地医院推进信息化、智能化,采取实名制、人脸识别等方式帮助患者正常就诊,保障医疗资源的公共性和公平性。

除了安排执勤人员在门诊外开展常态化巡逻外,上述医院还在进行其他打击挂号“黄牛”的行动。

记者从该医院负责接听投诉的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医院一直都在严厉打击挂号“黄牛”,首先要保证院内职工和“黄牛”是没有关系的,其次是保证号源的归属。该工作人员介绍,医院信息中心负责管理挂号系统,会对号源进行抽查和溯源,如果不是正常号源,有可能会遭遇拒诊。

据中国新闻网

